

被缚的经济巨人

一百五十年前，一度在欧洲横冲直撞、所向披靡的拿破仑曾面向亚洲东方的中国 喃喃道：“那边躺着一个沉睡的巨人 让他睡吧 因为当他醒来时 他将震撼世界！”如今 巨人已从酣睡中醒来，并且发出铿锵有力的声音，这声响彻云霄，震撼着地球每一个角落，令人不得不注意到这个傲然屹立于东方的国度。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余载，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从经济到政治、文化，从思想观念到行为方式，从表层形式到深层体制——举世瞩目。曾经的“东亚病夫”一度受尽屈辱，而今于沧桑中站立起来的是一张依然年轻的面孔，朝气蓬勃，并且因为曾经的苦难而更加珍惜今天的机会，在尝尽“落后挨打”的酸辣苦味后不忘以前车之鉴警后世之明。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就是不断摒弃旧的东西、在跌打中茁壮成长的过程。巨人腾飞，创造了惊人的奇迹，展示出无穷的潜力，但在前进中也受到各种各样的困扰：理论上的和实践上的。当腾飞的速度变慢时，就是中国面

临新的难题的时候，正是在解决难题的过程中，领导人的决策水平提高了，民众的市场意识增强了，整个社会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腾飞中的经济巨人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所折射的务实精神战胜了西方经济学家开出的“自由化”改革药方，中国人驱除了新中国成立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幻想，接受了邓小平的务实理念，“黑猫白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等语言，从形式到内容都透射出朴素的深邃。

起飞于改革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开始在北京天安门的上空迎风飘扬，广场上洋溢着喜庆气息。当毛泽东操着一口亲切的湖南口音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时，相信那一刻再也找不到比中国人更幸福的人了。从此中国人在这位把人民从三座沉重的大山下解救出来的神奇人物的领导下，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之路。

1951年至1953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基本上铲除了封建主义制度下的经济遗留，把生产资料从私人手里收归国家，为建立“一大二公”的经济基础做了充分的物质准备。“公有制”作为

与被马克思宏著《资本论》所深刻批判的私有制鲜明对比的经济制度 被社会主义革命实践者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所崇拜 与公有制密不可分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受到同样的礼遇。他们在实践中实验着“公有制 + 计划经济 + 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模式，把这三位一体中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推向了极端。“一大二公三纯”使公有制绝对化，“工分制”的平均主义使按劳分配简单化，经济、文化对政治的附庸性使计划经济体制高度政治化。继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的是一系列暴风骤雨式的“运动”：大炼钢铁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赶英超美的“洋跃进”、思想领域内的反右倾运动等等。目标只有一个：严格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建立一个苏联模式的翻版。新中国国民沿袭了战争年代对革命理想的向往和公而忘私的牺牲精神，在军事般的政治口号的动员下，焕发出狂热的劳动热情。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薄弱家底上迅速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建立了强大的重工业基础。当“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铺天盖地席卷过来时，人彻底丧失了作为人的一切尊严、权利和自由，国民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沿。人们诅咒着这个颠倒黑白、是非不分的时代，这场使中国历史又倒退 10 年的灾难为后继决策层提供了血的教训。

当毛泽东离开他曾经叱咤风云的人间世界时，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尚没有解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朴素论断中包含着改革的必要性。对于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搞政治斗争的中国人来说，选择改革是首次逆政治思维的产物，也是首次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唯物主义原理的产物。在生存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吃饭就是最重要的事情。马克思教导我们说，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

较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①这一教导告诉我们自然规律的客观必然性和不可违背性，我们必须遵循社会自然规律办事。越过资本主义这一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客观条件制约下，不可能进入经典理论所设想的那样的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发展阶段可以跨越，但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绝不可跨越，我们不可能饿着肚子讨论姓“社”姓“资”问题，生存是第一位的。这就是自然规律。

历史的重任落在了另一个同样伟大的人物身上。邓小平——一个在政治生涯中三起三落的智者，与毛泽东一样具有罕见的雄才大略，但同时又拥有与毛泽东的哲学家加文人的浪漫截然不同的务实态度，正是凭着这种务实，他引导已获得政治独立的中国人一步步走向经济繁荣和富强。1992年这位精神矍铄的88岁老人一句“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语惊四座，看似普通的一句话包含了我们党十四年来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上下求索的坎坷，反映出邓小平过人的政治智慧。这句话扭转了中国历史的乾坤，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人民终于从理论和实践上初步找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答案。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所折射的务实精神战胜了西方经济学家开出的“自由化”改革药方，中国人驱除了新中国成立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和“赶英超美”的幻想，接受了邓小平的务实理念：“黑猫白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等语言，从形式到内容都透射出朴素的深邃。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腾飞于正确的改革路径

我国举国上下不仅在改革的必要性上达到共识，在改革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达到共识，还正确地找到了改革路径：渐进式改革。我国没有像苏联、东欧国家一样企图毕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之功于一役而选择“激进式”改革道路。这种所谓的“休克疗法”带给苏联、东欧的不是成本最小化的成功和西方学者所设计的繁荣前景，而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中国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逻辑思维选择了迥然于“激进式”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先易后难、先局部后整体的逐步深入的改革方式，避免了改革过程中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利益的激烈冲突，从而避免了改革过程中剧烈的社会震荡，为改革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正是选择了这种道路，才使我国在与有着相同目标的俄罗斯、东欧国家相比，凸显了斐然的改革成绩。

中俄转轨时期宏观经济指标比较（1992~1997年）

国家	经济指标	1992年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中国	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	14.2%	13.5%	12.6%	10.5%	9.6%	8.8%
	通货膨胀率	14.8%	13.2%	21.7%	14.8%	6.1%	0.8%
俄罗斯	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	-18.5%	-12%	-15%	-4%	-5%	2%
	通货膨胀率	2500%	940%	320%	131%	22%	11%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1998年全国主要经济统计指标和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资料整理。

我国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率，1979年到

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 其中1992年至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1%，远远超出发达国家1.9%的年均增长速度和发展中国家5.6%的年均增长速度。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是1979年的5.92倍 这种增长速度只出现在60年代的日本和70年代的“四小龙”国家（地区）创造的增长奇迹中。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俄罗斯。俄罗斯自1992年实行激进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除1997年经济略有回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2%）外，一直处于大幅下滑中，并且伴随着恶性通货膨胀。1997年与改革前的1991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0%，下降幅度超过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25%、美国1929~1933年“大危机”时期的30%，整个国民经济倒退了将近20年。俄罗斯的政治动荡、国家分裂、民族矛盾、地区冲突、人民生活痛苦不堪等都是有目共睹的事，至今仍未恢复过来，更不用说发展了。

改革没有蓝图，马克思没有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应该怎样与市场经济兼容，其他市场经济体制成功的例子也都是私有制的成功。在探索这一崭新课题过程中，艰辛和波折都是难免的。但我国改革征途中每一次波折的经历都有其阶段性成果，也正是在不断总结这种阶段性成果的经验以及不可避免的客观失误和本可以避免的主观失误中，中国一步步走向了更大的成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十四大”确立了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目标在于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提出国有企业战略调整、收缩阵地的重要性，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在新的国内外经济条件下，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每一次大会召开都有实际内容，都是

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难点和人民群众的创新成果进行的定性，务实理念推动着中国走向一个又一个成功。

腾飞之佐证

我国在二十余载的改革开放中取得的成就令整个世界瞠目结舌，一度兴起的“中国威胁论”虽然纯属无稽之谈，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在国际上日益上升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中国在加入 WTO 的努力过程中，被美国、欧洲等国刁难，他们认为中国应以发达国家的身份进入 WTO 是又一例证。虽然他们是为了自身利益而使用了不太真实的统计数据来证明中国已进入了高收入国家群体，但下面的数据和事实都可以用来证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卓著成就。

——1997 年，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 7 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

——对外贸易总量跃升世界第 10 位。

——外汇储备量居世界第 2 位。

——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中国居民整体生活水平已接近小康生活目标，1999 年底物质生活实现小康标准的居民占 94.6%，比 1990 年的 49.9% 前进了 46.48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向前推进 5.16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实现程度为 96.6%，中部地区为 91.85%，西部地区为 82.34%。其中，1995 年我国提前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1997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前实现翻两番的目标，提前达到小康标准。

——三大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也趋向于符合世界产业结构演变的普遍规律，由 1978 年的 28.1:48.2:23.7 变为 1997 年的 18.7:49.2:32.1，即第一产业比重下降，作为经济发展水平重要

标志的第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

——作为现代化重要标志的城市化得到迅速发展。东部已形成以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以北京、天津、青岛、沈阳、大连为中心的环渤海城市群，以上海、南京、杭州、宁波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这些城市在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中国的科技实力大大增强，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部门，都得到了绝对的认可和贯彻。1997年取得的科学技术成果是1978年的11.4倍。我国科技工作者1999年在国际上共发表论文46188篇，比1998年增长32%，位居世界第八。根据美国三种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检索工具《科学引文索引》、《工程引文》和《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的数据，我国国际论文在全世界名列前茅。其中，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著作被收录24476篇，比1998年增长23.4%，位居世界第十；工程科学研究著作被收录14807篇，在排名上超过英国和德国，跃居世界第三；被收录的科学技术国际论文有6905篇，世界排名第八。科学技术的发表成果可以在一个侧面反映科技发展水平。^①

繁荣与冷落

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在20年的运行过程中，是以市场化为基本取向的，由市场经济启动的经济奇迹让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人民得

^①《经济参考报》2000年12月14日“我国国际科技论文总数跻身世界八强”。

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中国对国际事务也有了更大的发言权。

卖方市场的繁荣

以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成为世界奇迹。1978 年至 1997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 9.7% 居世界首位 远高于 3.2% 的世界平均水平。1992 年至 1997 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1% 而发达国家年均增长仅为 1.9%，发展中国家年均增长水平为 5.6%。中国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靠的不是别的，而是在逐步承认市场经济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过程中培育的市场体系。市场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只有商品市场的单一形式到生产资料、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多种形式蓬勃发展。

与人民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消费品市场上商品琳琅满目，花样繁多。在传统经济体制下，个人消费服从于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积累战略，个人需求被压抑。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作为个人权利受到尊重，被抑制的消费需求空前释放。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需求也不断扩展和转移：从仅重视价格到重视质量和品位；从仅追求实用到追求个性化和便捷性；从重视生活水平的提高到重视生活质量的提高；从追求物质消费向追求精神消费和服务消费转变；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向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转变 人们将更注重名牌消费 环保、节能、精神产品将成为消费的热点。智能化、健美化、方便化、个性化、绿色化正在逐渐成为人们的消费时尚。例如：

日常生活中 新四件（彩电、冰箱、洗衣机、录音机）代替老四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成为人们追求的家庭必需品。

奢侈品和生活必需品的概念明显具有了相对性。汽车、个人住房、通讯设备等所谓的奢侈品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庭中。城市居民对衣食的基本需求满足后，对家用电器等千元级消费品的需求也获得满足，现已开始追求住房和汽车消费。汽车和房屋不再作为只有单位才能购买、享受的奢侈品，购买主体从集体向个人转变。通讯消费也在信息经济的浪潮中显现普通本色。对手机的称呼也从“大哥大”归位到“手机”。

以我国上海市 2000 年上半年家庭消费支出为例，可看出我国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已达到比较高的层次。

上海市 2000 年上半年家庭消费支出统计表

消费类别	人均消费支出(元)	同比增长(%)
医疗保健类	235.66	52.80
交通、通讯类	354.19	41.30
娱乐、教育、文化	531.67	16.50
食品类	2003.98	8.70
衣着类	321.96	7.20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类	393.62	-13.20
杂项商品服务类	218.4	-7.70
居住类	320.24	-1.10

资料来源：《文汇报》2000 年 8 月 10 日“财经调查”。

上海 2000 年上半年消费支出同比增长 4.1% 增幅居首位的是医疗保健支出，其他依次是交通和通讯、娱乐和文化服务、食品、衣着类支出。这一变化趋势表现为上海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结构中日常用品和服务的需求比例降低，而医疗保健、通讯

交通等更高层次的需求比例上升。上海人的消费需求已达到较高水平。

反映居民消费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为恩格尔系数，即食物支出在居民消费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消费水平和恩格尔系数呈反向变化关系。恩格尔系数越低，反映消费水平越高，社会的富裕程度越高；恩格尔系数越高，表明社会消费水平越低，社会的富裕程度也越低。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恩格尔系数呈逐年下降趋势。全国恩格尔系数从 1980 年的 60% 下降到 1990 年的 56.8% 继而再下降到 1998 年的 48.57%，超越小康标准值的 50%，人们有一半多的钱可用于非食品方面的消费支出。

自 80 年代西式快餐连锁集团“肯德基”在北京市中心开办第一家炸鸡店大获成功以来，迄今为止已在北京、上海、深圳等 90 个城市拥有近 360 家餐厅，紧继其后“麦当劳”、“比萨饼屋”等纷纷在中国登台亮相，受到工薪族的极大欢迎。

总之，消费品市场由于发育较早、价格机制较灵敏而成为所有市场中最为活跃和规范的板块。

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等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形势喜人。企业不仅仅能通过银行实现间接融资，还可以在债券、股票等证券市场上直接筹集资金；不仅仅能在国内的深市和沪市（A 股）上市，还能在香港证券市场（H 股）和海外证券市场（B 股）发行证券。

银行商业化改革使其职能发生了质的变化，由被动地执行国家制定的政策的工具，转变为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市场主体，在自己的独立物质利益的支配下，更加重视信贷资金的质量，风险意识也大大增强。

人们手里的闲散资金不仅可用于储蓄，还可用作购买债券、股票作短线或长线投资，期权、期货、套汇、套利等更具风险性的

金融创新活动也在中国有了市场。

从 1990 年股市启动起 至今已有 10 个年头了，中国股市的理性大大增强。1990 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一些地方要求党员带头购买股票，以支持国家建设，几年以后，股市和政治脱钩，成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一批经济巨人通过证券市场发展壮大起来。“彩电大王”四川长虹、“冰箱大王”青岛海尔、“空调大王”江苏春兰、“汽车大王”上海汽车、“石化大王”上海石化等，都堪称证券市场上的“航空母舰”。

中国银行业、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和证券市场在波及全球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影响远远小于其他国家，运行平稳，显示出了较为纯熟的抗风险能力。

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方向是由市场作为劳动力资源的主导配置方式。劳动者与某一企业或土地的固有纽带被打破，他们不再局限于某种身份而终生不变，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和意愿寻找较为理想的职业。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没有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把全国几亿农民解放出来，就不会创造出乡镇企业作为经济新增长点的世界奇迹，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也离不开由于劳动力流动的藩篱被打破而大举出现的“移民潮”的贡献。

东南沿海地区以其先发之势的经济繁荣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空间吸引着中部、西部的“孔雀”东南飞，“一江春水向东流”确有其经济合理性。新近出现的人才“走西口”，则是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效应下西部经济发展的一个证明。

信息和技术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居于第一位，作为一种极具动态变化性和产权界定要求较高的生产要素，理应通过统一、开放的市场实现最优配置。我国信息产业发展很快，人们之间交流的距离缩短了，地球就像一个小小的村庄，交流自如。截止

到 1999 年底，我国无线寻呼、移动电话和本地电话年末用户数分别高达 4718 万户、4324 万户和 10881 万户，分别是 1990 年的 107 倍、2162 倍、16 倍；城市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 7 部多。邮电业务总量按 1990 年价格计算为 3311 亿元，是 1990 年的 40 倍，1995 年的 3 倍多；而其中的电信业务发展更是惊人，电信业务总量按 1990 年价格计算，1999 年高达 3113 亿元，占邮电总量的 94%，是 1995 年的 3.5 倍。过去人们不敢想的或想不到的通信方式和手段出现了，国际互联网也迅速进入普通家庭。1999 年，国际互联网络用户达 89 万户，是 1995 年的 12 倍；城市每百户拥有家用电脑近 6 台。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尼古拉斯·内哥罗蓬对此现象惊呼道：汉语将成为国际互联网上最普遍使用的语言。很难设想如果中国一直以过去 20 年改革开放的超常速度发展下去，会是一种什么前景。

以中共“十五大”为契机，国有企业间的产权购并市场的发展成为市场化进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产权重组意味着对国有企业的管理从传统体制下的实物管理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本管理方式的转变，有利于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优化组合，有利于企业通过优势互补提高整体竞争力。

总之，从 1978 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在 20 年的运作过程中，是以市场化为基本取向的，由市场经济启动的经济奇迹让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人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中国对国际事务也有了更大的发言权。在 2000 年召开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我国首倡实现了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首脑首次会晤，中国人的呼声正在得到世界的认同和响应。

以市场化为改革的基本取向是我国 20 多年取得伟大成就的最重要的经验。

买方市场的冷落

但是,1997年以后中国的市场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转化为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大多数农副产品和工业性生活必需品由过去的按户凭票供应发展到目前的敞开供应,并出现相对过剩。98%的商品出现了供大于求或供求平衡的状况。中国经济在整体上告别了持续四十年的短缺时代,从整体上扭转了一百多年来的匮乏局面。

短缺时代的结束是认为短缺是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的困境的经济学理论的破产。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anos Kornai)在其1980年的代表作《短缺经济学》中基于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批判,他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企业具有“父爱主义”保护行为,致使该破产的企业无法破产,对企业无法构成成本—收益的硬性约束,而软预算约束下的企业难以成为真正的生产经营单位因为它们动力不足管理落后;“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严重。

“搭便车”指每个人都只愿享受其他人创造的收益而不愿意承担风险,以至于对公共产品消费的成本和收益,无法和私人产品的成本和收益相等,出现外部不经济现象。“搭便车”被认为是公有制下必然的机会主义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对社会的供给数量和品种有限,人们的各种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供不应求的短缺就成为计划经济体制下普遍的经济特征。科尔奈的结论得到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和部分主张经济私有化的东欧学者的认同,他们认为由于体制障碍,社会主义的供给和需求之间有一条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经济不均衡是社会主义必须面临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没有解决的途径,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激烈的社会变革,包括经济上的私有化和政治上的民主

化。

历史的发展似乎印证了他们的理论逻辑，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现的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格局使社会发展一直受制于生产的匮乏，“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优越感助长了国有企业的惰性，不适应市场竞争，而国有企业的发展动力不足、资源浪费、管理落后、“搭便车”等行为确实成为普遍存在的事实。但是事情没有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这种状况终于在 1997 年得到根本性改变，“需求制约型”的买方市场代替了供给制约型的卖方市场，对生产者形成了强有力的市场和需求约束，厂商的优越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他们之间的竞争加剧，这种竞争和需求的约束促使他们不得不积极面向市场，根据市场需求组织生产，把消费者利益放于第一位。消费者的被动地位得到改变，选择空间大大扩展，其权益更易得到保障。

但是，历史的发展又陷入了另一种逻辑，当中国告别持续一百多年的短缺时，人们并没有强烈感受到富足的喜悦，因为过剩状态下，人们又必须面临另一些尴尬的场面。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从 1990 年的 3.8% 的谷底，迅速上升到 1992 年的 14.2% 的高峰之后自 1993 年起平稳回落，1993 年为 13.5%、1994 年为 12.6%、1995 年为 10.5%、1996 年为 9.6% 到 1999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 7.1%。虽然增长率从 1993 年至 1999 年连续下降了 7 年之久，但前四年的下降主要是因为国家为了控制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而实行了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1996 年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软着陆”，即较高的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同时并存。

1997 年许多经济学家和政界人士都对经济前景做了极为乐观的估计，认为国家宏观调控已经达到预期目的，经济已步入良性上升轨道，一路下滑的增长速度应该止降回升，1997 年被

许多专家预测为经济增长的“拐点”。但经济运行的实践却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继续走低，由 1996 年的 9.6% 下降为 1997 年的 8.8%、1998 年的 7.8% 和 1999 年的 7.1%，这几年的增速下滑原因和前几年不同，并不是国家实行紧缩政策的结果。实际上，从 1997 年开始，我国政府已经开始实行比较宽松的宏观政策以扩大投资、启动消费、推动出口。这些措施对拉动经济增长、制止经济大幅滑坡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增发国债、扩大投资对拉动经济增长率的贡献，1998 年为 1.5%、1999 年为 2%。就是说 如果没有增发国债、扩大投资的措施，1998 年的经济增长率就不是 7.8% 而是 6.3%，1999 年的增长率就不是 7.1% 而是 5.1%。

与前期增长率下降伴随的是通货膨胀不同，这次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同时出现了通货紧缩（即物价的持续下跌）。1998 年零售物价指数出现了 2.6% 的负增长，1999 年零售物价指数为 3% 的负增长。通货紧缩是萧条状态下的经济现象。持续的通货紧缩不利于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反而成为总需求不足的诱因。这是因为在市场上普遍存在着供大于求的情况时，企业产品有三种选择，一种是滞销，一种是存货增加，第三种选择就是以低于正常价格水平的价位削价倾销，致使企业的成本消耗得不到应有和及时的补偿而受损，这就造成一系列不利于增加需求的因素。

首先，企业亏损导致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从而降低了政府消费和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需求不足的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

其次，企业不景气造成职工工资水平下降，居民的消费行为较为谨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也不看好，即使价格下降，他们的现期需求也难以增加。美国在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时

期 物价下降了约 1/3 但消费仅仅增加了 0.5%。

再次，物价的持续低落会减少企业收益，企业的投资积极性遭受挫折，从而减少投资需求。企业还会裁减职工，增加社会上失业人数。据估算，我国物价每降低一个百分点，下岗和失业者会增加三百万人。

我国纺织、冶金、制糖、煤炭等重点行业产业价格在买方市场下全部走低，冶金业价格连续低迷 6 年 糖价 3 年下跌 重点行业的价格降到了成本以下，严重的亏损使整个国民经济增长遭到挫折。生产资料价格从 1996 年 4 月进入负增长，到 1999 年 12 月连续 45 个月同比下降。消费品零售价格指数自 1997 年 10 月进入负增长，到 1999 年 12 月连续 27 个月同比下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从 1998 年 3 月进入负增长 到 1999 年 12 月连续 22 个月同比下降，过去人们未曾遇到的概念频频出现于各种媒体。与国民经济增速下滑和通货紧缩相对应的是就业形势日趋严峻，1997 年到 1999 年三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均为 3.1%。

过剩的产品在国内市场滞销，库存积压增加，而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出口量大大降低，在全球经济整体上都进入了过剩时代的条件下，过剩产品在国外市场消化的可能性也几乎没有。厂商在急于处理过剩生产能力心理的支配下，把保持和扩展市场份额作为首要目标 不断掀起‘宁让利润 不让市场’的价格大战。彩电、空调、微波炉等具有充分竞争性的家用电器的降价风潮昭示着这个行业的优胜劣汰已迫在眉睫，但由于我国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没有充分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导致该被市场淘汰的依然在生存着，而优秀的厂家无法完全得到市场的认同。在这种恶性价格竞争中，甚至最优秀的企业也难逃亏损的厄运。